

Series of Works by the Doctoral Advisers of Hebei University

河北大学博导书系

宋史论集

SONGSHI LUNJI

李华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善军

徐树林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闻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史论集/李华瑞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8

(河北大学博导书系)

ISBN 7-80128-737-0

I. 宋… II. 李… III. 中国—古代史—宋代—研究—文集 IV. K2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45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5

字数:282 千字

印数:2001~4000 册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4 月第 2 次

ISBN7-81028-737-0/K·50

定价:27.00 元



李华瑞 1958年2月生，四川绵竹人。1978—1985年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学士、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宋辽西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迄今已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编著4部，参编著作7部。其中《宋夏关系史》、《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分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二 等奖。

出版说明

值此河北大学八十周年华诞之际,《河北大学博导书系》与读者见面了。

八十年的风雨历程,使河北大学逐步成熟,渐入佳境。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更使河北大学如浴春风,飞速发展。成就世人瞩目,展示方式丰富多彩。作为学校有机组成部分的河北大学出版社,为了向校庆献一份厚礼,更为了学校的超常发展,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能力,决定编辑出版《河北大学博导书系》。

大学之“大”,不在其楼高院阔,而在它的文化创造能力、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在河北大学范围内,博士生导师是肩负文化创造、传播和发挥影响力重任的主要力量。《河北大学博导书系》选取科研论文结集出版的形式,旨在总结以往的科研成就,展示目前达到的科研水平,以期向世人汇报河北大学的文化创造能力、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

《河北大学博导书系》涉及内容广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河北大学的综合性质;其中的每一本、每一篇论文,都是作者劳智费神的创造性结晶。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有切身的感悟和体会。

在《河北大学博导书系》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也承蒙博士生导师们极力配合和积极参与,对此表示诚挚谢意。

河北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本论文集主要收入我于 1990 年博士毕业后至 2000 年 10 年间撰写的部分论文。按照各篇文章的题目,大致可分为宋代政治,宋与西夏、金关系和宋代经济史三大类八个部分。

开头 5 篇中有 3 篇论文集中讨论了宋初黄老思想、先南后北统一方针和宋代政治史的分期,对学界讨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宋代建元与政治》和《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两篇是平时在读书过程中逐渐积累有感而发。

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王安石变法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关注从理论上、方法上对王安石变法研究进行反思,亦即对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的反思。我希望在今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写出一部内容涵盖南宋初至二十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 2 部分关于宋代政治变革方面的 4 篇文章,即是为这种努力所作的前期准备。

宋夏关系史是前些年我用力较多的一个领域,收入本集的 5 篇文章就是我在撰写《宋夏关系史》一书过程

中先期发表的。该书已于 1998 年出版。

第 5、6、7 部分都是关于宋代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和书评。宋代经济史研究是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优势领域,虽然这 10 年间我写了不少经济史之外的文章,但宋代经济史既是我过去,也是我将来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

附录一是两篇关于国际宋史研讨会的论文综述,所以把它们收入本集,主要是因为参与和组织了这两次盛会,想藉此记录两次盛会期间宋史同道相互交流学习的心路历程。

附录二所收文章撰写于 1980 年,当时我正在大学读二年级。虽然这篇文章不是宋史方面的论文,但它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当年曾以此篇论文在兰州大学参加了首届西北五省人口理论研讨会,得到大会组织者和与会代表的好评,由此树立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坚定信念,收入本集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河北大学领导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在此谨表谢忱。同时借论文集出版之际,向培育我多年的老师漆侠先生表示真挚的谢意和敬意;也向我的妻子水潞说几句感谢的话,不仅要感谢她十多年来默默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使我得以从容写作,而且她还是我发表的大多数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为我打印,编辑文稿。这部论文集也浸透着她的一片心血。

目 录

序言	(1)
论宋初的统治思想	(1)
宋代建元与政治	(33)
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	(53)
关于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	(69)
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 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	(81)
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103)
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	(117)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看李焘对王安石 及其新法的态度	(135)
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156)
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	(172)
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	(191)
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212)
论北宋与河湟吐蕃的关系	(231)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	(247)
宋金太原之战	(260)
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	(276)
宋代酿酒业简述	(289)
西夏酿酒业初探	(314)
中国烧酒起始探微	(332)
中国烧酒起始再探讨	(356)
宋代画市场初探	(374)
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	(396)
读漆侠、乔幼梅先生《辽夏金经济史》书后	(421)
评《宋代市民生活》	(433)
《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评介	(437)
附录一	
1991 年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综述	(442)
2000 年“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 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457)
附录二	
控制农业人口是当务之急	(465)

论宋初的统治思想

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赵宋政权确立和巩固的重要时期,也是安史乱后中国历史由动乱重新走向大治的时期。在这个重要的时期内,封建统治者采取何种统治思想来指导重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呢?就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状况而言,几乎一致认为是把黄老思想作为宋初在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并由此形成黄老之治的局面,以及导致宋初保守政风的形成。^{*}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与宋初政治思想的发展实际多有不合,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黄老思想在宋初政治上的作用。实际上,宋初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仍是儒家的政治思想。本文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一、宋初黄老思想的发展及其 与汉初黄老思想之比较

黄老政治思想在宋初受到一定重视,这是事实。

但,统治者有黄老思想与统治者把黄老思想作为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自两晋南北朝以降,儒佛道三教互相排斥、互相吸收,迄唐宋之际逐渐融会贯通,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因而唐宋之际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在信奉孔孟学说之外,又笃信佛道,并不足为奇,此乃当时的一大时代特征。所以说,宋初最高统治者有一些黄老思想,并不意味着黄老思想在宋初政治上就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事实上黄老思想也不是宋初的治国总纲领或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

首先,看一下黄老思想在宋初的发展。从现存史载和今人的论述来看,宋初黄老思想的流行主要是在太宗和真宗两朝。而太宗大力提倡黄老思想又集中在太宗晚年,亦即在距太宗去世仅五六年的淳化年间。^①太宗其所以在晚年大力提倡黄老思想,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心理因素。我们知道,太宗继位的问题是一千古之谜,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争论不休。不论太宗是弑兄篡位,还是合法继位,这里不妄作评论,但太宗为了确保皇位,数起大狱,采取了诸多非常手段却是事实。如“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②对此,朝廷内外“远近腾口,咸以为非”^③,以致于太宗对来自朝廷内部的“奸邪”可能危及皇位的“内患”,耿耿于怀,深惧于心。^④太宗又急于建功立业,想以收复燕云,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导致两次北征契丹惨败。辽朝

军事上的强大使太宗欲有为而不能为,就是号为小蕃的党项族崛起于西部,虽几番调兵遣将剿杀,极想以武力使之俯首贴耳,但事与愿违,愈剿杀其势愈壮,太宗终无所获。军事上的一再失败,使太宗对建功立业心灰意冷,遂产生“厌兵”情绪。他曾对臣下说:“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朕每议新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政治之道也。”^⑤并多次引用老子的话“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显然由这些事实来看,太宗提倡黄老思想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自继位以来欲有所为而不能为的一种反动,其实质是为苟且偷安的对外政策张目,此与有的人认为太宗“以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为修身治国的总纲领”的观点相距甚远。

有论者以为真宗时期乃黄老思想甚为流行的时期,也是黄老思想对当时政治甚具影响的时期,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生性“聪明必多作为”的皇帝,在北宋九位君主中,是最好“兴作”的二位皇帝之一(另一位是宋徽宗)。真宗喜好兴作,系指大中祥符以后所搞的“天书封祀”闹剧。此闹剧从大中祥符元年导演天书下降之后,至乾兴元年真宗死去,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将天书殉葬为止,十五年间,东封泰山,西祀汾阴,营建玉清昭应宫,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宫观迭起。这场闹剧旷日持久,规模宏大,劳民伤财。据《宋史·食货志》载:“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增二十

万。”大中祥符以前宋财政尚宽余，三司使丁谓说“大计固有余”，然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大中祥符四年丁谓则说“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恐有司经费不给”^⑥。再看营建玉清昭应宫“凡役工日三四万，发京东、西、河北、淮南州军禁军，调诸州工匠每季代之，兵卒岁一代，并优其口粮、资值”^⑦，“宫凡三千六百一十楹”。^⑧“耗费国帑不可胜纪”，^⑨至于“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⑩越演越烈的宫廷奢靡之风，其耗费也是惊人的。这些活动所造成的直接的经济后果，就是“海内虚竭”。^⑪显然，这场闹剧所表现出的大事兴作与黄老清静政治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与汉初黄老之治大相径庭。^⑫

再从时代背景看，论者以为以清静无为为特征的黄老政治思想特别适应大动乱后的统一政权，能够迅速将社会导向安定，西汉初年如此，宋初七十年亦如此。也就是说时代需要决定了宋初统治者对黄老思想的选择。若单就赵宋政权建立在晚唐五代大动乱之后，与汉朝建立在秦末大动乱之后的“乱”的形势而言，两者有其相似之处，但宋初政治绝不是汉初政治的简单重复。换言之，汉初和宋初治“乱”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

众所周知，秦王朝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它昙花一现，仅传及二世便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灭亡了。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

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这样就形成汉初统治者的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⑬但黄老思想总归只适合汉初休养生息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需要。黄老思想的反人文主义的实质,它的崇尚自然俭朴而反对文教、文化、生活享受和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思想,终归是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的。所以一当经济恢复,政治安定以后,吸收黄老和各家思想而又高于黄老和各家思想,适应巩固大一统的封建政治需要的新儒术,便很快取代了黄老的地位,而成为社会和思想的指导思想。

宋初政治虽是建立在大动乱之后,但它与汉初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却大不相同。其一,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唐中央制约地方的政治经济权力被大大削弱。经安史之乱,形成藩镇跋扈,尾大不掉之势,五代则是这一势态的继续和发展。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迭,五十余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伦理纲常,特别是君臣一纲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宋的建立未经过农民战争的冲击,所谓“受命之日,市不易肆”,^⑭因而,重新确立和调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对宋初统治者来说不如汉初那样紧迫。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

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分裂割据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其二,宋建国之时,天下尚处在分裂割据状态,“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⑮因而实现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大一统政治目的,是宋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主要活动之一。

其三,五代总的来说,战争频仍,暴政迭出,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中原地区自一代英主周世宗继位,采取了一些诸如奖励耕植,招抚流亡,平均赋役;限制寺院,减少浮食,崇本抑末;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路;发展工商,整顿钱币等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其社会经济已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⑯而南方在中原战争四起之时,多能保境发展经济,特别是荆楚、吴越、南唐和后蜀的经济取得较显著的进步。故当时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统一方略时,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南方殷实的财富。及太宗灭北汉基本上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之时,宋的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李心传说“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而两倍唐室矣”。^⑰这与汉初在经历了动乱之后的那种“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⑱的窘境不可相提并论。

由这三点而论,汉初与宋初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大区别,因而宋初不可能重蹈汉初无为政治的旧辙。

二、从宋初经济政策看宋初的黄老思想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宋初经济政策如何,这是检验黄老思想在宋初是否居于主导地位的关键所在。有的论者以为黄老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与民休息、静以致治,因此在汉初得以盛行六十年,同样在宋初也得以盛行数十年。还有的论者认为,宋初数十年实行黄老无为政治的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过多地扰民,让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讨论之前首先应澄清一个误解,即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黄老的无为思想,其实这是一种不够全面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不是只有在黄老无为思想下才得以实行,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也是儒家民本、仁政、爱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历史上每一盛大王朝初期,出于巩固和稳定其统治需要,统治者都多少要实行一些减免租税,鼓励垦荒,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如隋开皇之治,唐贞观之治,明洪武之治等,而这些“治世”的出现并不是在什么黄老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所以,与民休息的理论依据不可以黄老思想一言以蔽之。

毋庸讳言,宋太祖、太宗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过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它绝不能与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相提并论,其经济政策更谈不到“清静无为”和“不过

多地扰民”。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对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军队和官僚尤下功夫。由于优待文武官僚和实行养兵政策,因而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发展,官僚队伍和军员数便不断膨胀。譬如,军队总数从太祖初年22万人到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90余万人。^①而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皆“仰天子之食”^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宋初“克服天下在即位后”,^③在长达二三十年的统一战争过程中,战争开支当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皇居常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薛居正等闻上言,皆喜。其后征晋阳,讨幽蓟岁遣戍边,用度寝广,盐铁榷酤,关市矾茗之禁弥峻。太宗尝语近臣曰:‘俟天下无事,当尽蠲百姓租税’终以多故,不果”。^④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政策还能够反其“无所不为”而行“静以致治”“不过多地扰民”的无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宋朝自建国开始,便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一面采取措施积极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一面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且不说为了削夺地方藩镇的财权,以设置诸路转运使和以低级使臣、京官、选人充任各地监当官等手段“制其钱谷”,就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而言,宋初统治者也是“网利太密”,与汉初“轻徭薄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与民无禁”“从民之欲,而不扰乱……风流笃厚,禁罔疏阔”^⑤形成鲜明对照。请看下面的事实。